

第一章 导 言

这世界上已有数量惊人的著作，如果我们的著作不能有所创新，那我们肯定不应该将它们出版。作者在开始挥笔之日，便应是洛阳纸贵之时。

Skinner 2001b 21

政治思想研究中的革命

卷首引语是昆廷·斯金纳 1996年 5月在阿姆斯特丹与伊夫·扎卡辩论时的即兴评论。这不仅表明了斯金纳对著书立说的态度，同时也是一项提议，创新应该是评判学者学术贡献的质量和意义的重要标准。历史学的创新常常意味着对所讨论的问题进行重写或者修正（参见 Koselleck 1988b, 37—51）。用“修正主义”一词来概括昆廷·斯金纳自 1970年代以来一直强调历史研究的重新解释，并将之作为历史研究的标准特别合适。通过与学术界正统修辞中的另一个标准，即真实相比较，创新的重要性更可凸显。在《答复我的批评者》一文中，昆廷·斯金纳写道：

总而言之，我确信对我所考虑的历史研究来说，真实的重要性被夸大了……例如，马基雅维里坚信雇佣兵常常使政治自由陷入险境，也许我们应该不停地追问这是否属实。但这么做的后果却有点像问法国的国王是否秃顶一样，对此，最好的回答似乎是，这并没有真正提出问题。（Skinner

1988c, 256)

在历史研究中将真实与创新对立起来，这是昆廷·斯金纳研究工作的鲜明特色。这种对照将他置于分析哲学和经验主义历史编纂学和经验性问题的类型之外，对这样一种流行观点——他是一个典型的英国思想家——提出质疑（例如 Miller & Strong 1997）。斯金纳关于真实和创新的观点特别有助于我们在欧洲的一个更为广泛的关于知识和学术的透视主义传统中对其进行定位，这种传统，例如体现在尼采和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欧洲解释传统之中来对他进行定位。

在这种透视主义观的经典阐述中，韦伯 1904 年那篇论“客观性”的文章可以被视为其观点的起点，他认为没有任何一种分析可以独立于确定且片面的视角（Weber 1904, esp. 170, 181）。在研究“同一个”问题时，始终可能并要求有很多不同的视角。人文科学的历史就是各种解释建构、修正和消解的历史。除了各种解释自身间的竞争之外，没有什么“客观”的标准来评价人文科学的研究工作。从另一种视角来进行判断，“事实”的意义及其有效性常常会变得面目全非。经验分析也许是挑战特定观点，或者是改变各种观点共存状态的一种可用的方法，但仅这么做是远远不够的。在韦伯看来，“切近事实真相”并无意义，各种解释的趋同意味着僵滞。我们甚至不能确定哪些问题与领域应该是核心的，因为它们也是由不同的观点来决定的。此外，它们也随着不同的历史情境而变化（Weber 1904, esp. 184）。

带着这种人文科学历史透视观，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昆廷·斯金纳关于真实和创新的观点。在分析过去的信仰时，对其真实性的估量可能会阻碍我们理解它们的历史特性和价值。相反，创新性主张可以被视为通过调整视角和也许制造新的竞争“参与者”来改变当前状态的行动。

通过科泽勒克，我们可以区分三种重写历史的方式：新材料、对材料的新的解读模式、新的阐释视角（Koselleck 1988b, 45—7）。在对政治思想史的重新阐释中，斯金纳已经对这三种方式全都进行了实践。第一种方式是，斯金纳有意识地使用那些在政治思想史中非经典性的材料，由此他修正了人们对马基雅维里、霍布斯等经典思想家的看法。通过对语言行动理论和古典修辞学等学术资源的运用，斯金纳改变了

发问的方式 例如 强调与“语言行动”有关的问题 而不是仅仅追问与“意义”有关的问题(Skinner 1996a, 7—8)。

然而，在思想史和政治理论研究中，昆廷·斯金纳最为杰出的贡献在于，他转换了整个研究的视角。同时，在政治思想研究中，斯金纳毫不妥协地坚持为这种视角转换进行辩护。在《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的序言中，他写道：“因为我认为，政治生活本身为政治理论家设定了一些主要问题，使得某种特定一类论题看起来成为了问题，并使这些相应的问题成为了辩论的主题。”(Skinner 1978a, I, xi)

这是对我愿称之为在政治思想研究中的“斯金纳式革命”的典范式的表述。革命一词应在旧有的字面意义上去理解，即它使研究转向了新的方向。斯金纳式的革命的关键在于这一表述又被重新解释：他并不分析“应用于政治领域”的思想，而是分析“以政治方式进行思考”的思想。政治性思考就是政治行动本身的一个方面。

就像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大学里所实践的那样，政治思想史仍倾向于以这种看法为起点，即认为政治学是一个肮脏的学科，只有通过特定的哲学原则来改善。弗里德里希·梅涅克在其经典著作《国家理性的观念》一书中假定，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存在着一条理想的行动路线，这条路线只能由这个国家的主要政治家来发现(Meinecke 1924, 1—2)。这种观点把政治学降格为只是以可能是最好的方式对某些现存原则的运用。

将“政治生活本身”当作起点恢复了政治行为主体的地位，他们的价值不再被贬低，或者只起着某些原则的承担者或代表者的功能。相反，他们的言行被视作为是对行动的第一个层面的解释，然后在没有贬低行动本身价值的情况下又被很多学者们再阐释。通过关注政治行为主体不断转换问题，对政治的理论化使得这种行动的特性和意义变得清晰和得到反思。在作出判断以及相互争斗的情况下，政治家们需要相当大的独创性，他们是一群被迫要面对危机、政治僵局以及有淘汰出局危险的人。研究政治思想史的前提之一便是理解政治家们的这种独创性。

在《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一书中，斯金纳写到，企图让思想史更接近“真正的历

史”的一个后果，是可以使思想史成为一个能令人感兴趣的学科。我认为，斯金纳式的革命在政治学中产生了同样的影响，如果政治生活本身为政治思想研究设定了问题，那么对政治行动的阐述和反思就成为政治研究的关键。如果我可以“以言行事”（奥斯汀）或者说“语言就是行动”（维特根斯坦），那么分析语言和修辞的运用就是政治“现实”的构成部分，也是政治思想的组成部分。

这么做也是为了承认和运用政治作为活动的内在偶然性（参见 Pocock 1975）。斯金纳坚持认为偶然性在理解中具有启发性的价值，就像他在回顾批评 A·O·洛维乔易观念史研究类型所作的评论那样：

为了反对这种论点，我再一次提及思想史中一种更为根本的偶然性，在吸收维特根斯坦的一个建议的基础上，我认为不可能有这种所谓的观念的单元的历史，有的只是对这些观念在不同的时代被不同的代理人进行各种各样运用的历史。我斗胆放言，在这些运用的后面不存在任何历史，他们的历史只是我们所要撰写的观念的历史。（Skinner 1996c, 61—2）

这种对偶然性的坚持可以上溯到马克斯·韦伯根据机会和不可预料的后果来解释人类行为的唯名论的观点（参见 Palonen 1998）。然而，在理解政治作为活动和对理论化的模式中，斯金纳所运用的语言行动理论和修辞学的工具使得他的观点带有了语言学的诡辩论调。在斯金纳的著作中，我们同样能够察觉出一种韦伯式的做法，将政治价值的地位恢复为一种偶然行动，和至少对在政治理论中非政治化倾向的一种批评。这种亲政治的取向也在斯金纳的那些看似纯粹的历史研究中充当了一种启发性的工具，结果使那些研究纳入了政治理论化的一种模式（参见 Palonen 2002c）。

一种政治的解读

一种历史理解的透视性的观点和创新的标准同样被当作本书的指导原则。我的“昆廷·斯金纳思想研究”作为文本复合体的速写式标题，也有它自身一种明确的

轮廓。与常见的那种指责斯金纳片面的倾向不同，我想根据韦伯的意见（1904,194）提出如下看法，这种看法就是要“片面”强调斯金纳著作的某些方面而不顾其他，只有坚持这种特定的看法，我们才能对斯金纳的著作有着更好的理解。

理解这种看法的线索已包含在本书的副标题“历史·政治·修辞”之中。这些词语呈现了斯金纳研究工作的跨学科特征。他首先被训练成为一个历史学家，然后凭自己的能力成为了政治理论家，大约从1990年起，他又转向对古代和文艺复兴时期修辞学的审视，这给他的研究工作又增加了另一个特征，既是历史学家又是政治理论家。

对我来说，政治是这个标题中的关键词。我把斯金纳对历史编撰学和修辞学所做的贡献当作为对政治理解的贡献。虽然我不太了解他所研究的阶段，即14—17世纪，同时我也不熟悉斯金纳所处理的那个时期浩繁的原始材料。此外，我对“一般”的历史学家和修辞学家之间的专业辩论的有限了解也使我无法进入其中。但是，20多年来，我一直在研究政治概念史，这使我能够探究对于政治的辩论，在这个方面，斯金纳的贡献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认可，由此，我也在斯金纳的文本里读出了某些“弦外之音”（参见 Skinner 1988c,272）。

我把斯金纳作为当代学术文化的“理论政治家”，这种学术文化由在众多的大学、各门学科、辩论、方法和其他传统实践层面上的一种政治综合体所组成。我想详细说明斯金纳在现存的政治综合体中的政治行动，以及在这一政治综合体中改变现状的政治化行动。他在《答复我的批评者》一文中说，“我所考虑的言辞类型绝不能简单被视作一连串的论点；它们同时必然也被当作论据”（Skinner 1988c,273）。

按照韦伯式的术语，我将把政治活动（politicking）看作为在现存的政治体中寻求新的权力分享，而政治化则关注在一个政治综合体中这种分享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以为政治活动拓展新的游戏空间的方式来进行的（参见 Weber 1919a,36）。韦伯认为，政治机会是实现政治目标或目的的必要中介。同样，我认为，斯金纳的修辞行动和修辞战略是理解他的理论贡献的一个前提，这常常与语境、状况和要被“打动”的受众相联系（参见 Skinner 1974a and b）。对斯金纳来说，理论和阐释是特定争

论中的论据，历史活动的目的在于识别这些理论和阐释所引发的争论，并清楚地说明他所使用的修辞比喻和象征。政治中的行动步骤是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追求技巧，而政治化的行动步骤则是激发受众，或通过在辩论中扩展新的范围来创造获取权力的新的机会。

按照尼采的一句名言“没有事实，只有解释”(Nietzsche 1981, 904)，或者用斯金纳的话来说，“社会与政治的世界被一遍又一遍地解释”(Skinner 2201a, 22)。就像斯金纳所提出的那样，从透视性的观点看来，关于事实的争论是专业辩论的一部分，而这并不是本书所关注的内容。

作为处在英语学术世界之外的学者，我希望能对斯金纳作出客观的解读。我所处的地位使我能用全新的眼光来看待他的工作，从而避免通常对他所做的标签、归类与划分。首先，我不会写一本接受性研究的著作，但是，我会提及接受中的某些倾向，偶尔也会进入细节的讨论，如果这样做有利于解释我自己的观点的话。

通过研究 20 世纪欧洲大陆的政治思想，我对斯金纳的著作产生了一种距离感。将斯金纳与一些德法学者之间的分歧与一致同时展现是本书的核心策略。斯金纳本人曾在不同的场合承认他受益于韦伯的历史研究和方法论的观点。在我的阐释中，他们之间的这种联系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凸显。

当然，这本书并不是为斯金纳辩护。不同的背景、研究兴趣和生活方式已使我与斯金纳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当读者使用这本书当作研读斯金纳本人著作的入门指南时，他们将会发现我主要是以评论和建议的方式提出我的批评，从而没有扰乱本书的主要任务：阐释。

今天，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涵括语境特质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但如何使斯金纳的著作语境化呢？我已经避免了写一本以斯金纳为中心的，自 1950 年代到今天的欧洲或英国的政治史加思想史的诱惑。我尽量提出读者所了解的语境性论据，并用评论、注释或者详细的说明对其加以补充。我认为，作为大陆学者的视角将有助于我判明什么地方需要加以详细的说明。

用修辞学的话来说，我对斯金纳的工作的解读既是公正对待其内在的历史，同

时也是在他的各种不同的著作中寻求某些经常出现的主题。他的工作的内在历史是呈现、分析与评价的出发点。通过这些主题，我时常想在斯金纳的工作中探究他对政治理论化的贡献，而他本人则并未强调这一贡献（参见 Skinner 2001a,15）。我的中心之点是利用“读者的自由”（Sartre 1948,95—9）来强调斯金纳的某些方面，尽管他自己只对这些方面作了某些暗示。

为了更好地估量斯金纳的贡献，我每一章都选择了相关的其他著作，主要是那些先于斯金纳的著作来作为比较的基础。我的主旨在于，通过提及那些斯金纳在自己的讨论里有意或无意忽视的内容来强调他的研究工作。

在每一章里，我将提出一个主要的论据来支持我的一般性的论题。这个论题是关于斯金纳为政治理论化所做的研究工作的新颖性和卓越性。因而通过各种主题层面建构起了斯金纳的思想肖像。这些层面，部分是历史的，部分是分析式的，如果综合起来考虑，这将使他的工作无法被模仿。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方法论的一致性”是一本著作轮廓清晰的必要条件，我还是想留给读者一些空间来讨论斯金纳的部分工作，而不必赞同我高度个人化的解释。

在第二章里，我主要叙述了思想和政治状况以及剑桥的环境。这些塑造了斯金纳的教育、经历和早年的工作。我的兴趣既不是把斯金纳当作“剑桥学派”的典范，也不是通过他的工作来讨论这一学派的形成，我想讨论的是那些独立特行的历史，这些行动给斯金纳的工作赋予了个性化的轮廓，同时也引起了背景各不相同读者的兴趣。

在讨论斯金纳所进入的那个世界的政治理论和思想史的状况时，我想例证政治思想研究中历史方法的崛起，特别是在剑桥的崛起。我这一章的要点是分析在斯金纳的工作中，“历史”被作为规范性价值的运用。在斯金纳早期关于霍布斯的研究中，对历史的规范性运用特别突出，但强调历史的维度是贯穿他整个研究工作的一种批判性的工具。

斯金纳在 1960 年代后期开始超越了作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家的争论，他做到这一点所使用的一个工具是表述性的语言行动的视角。这一视角既被当作对

现存学术的批判工具，也被当作历史分析的工具。我在第三章中讨论的是，斯金纳构想出了一个将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的哲学转化为历史分析工具的方法。就像被斯金纳转化的那样，行动的现实性获得了一种政治的维度，而这在当时是被哲学和社会学的方法所摒弃的。

当斯金纳超越了这样一种关于观念的讨论，即要么视观念为原则，要么仅视其为行动的合理化——强调它们为行动的合法性进行辩护的意义的时候，他把政治清晰地主题化了。在本书的第四章，《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被解读为如下模式的典范。在这一模式中，斯金纳得出，政治行为主体不断修正他们的理论，以使这些理论更其有力地支持他们行动的合法性。政治思想的“现代性”在于赋予政治行动的优先性，而其“基础”则指那些仍没有被当代人所质疑的思想史中的元素。

在第五章里，斯金纳的研究被解读为从过去的历史中发掘出“丢失的瑰宝”，这就像自由的概念史所表明的那样。自从 1980 年代早期开始，斯金纳一直在研究共和主义，然后是新罗马消极自由的理论，这么做部分原因是，为了显现当前哲学辩论里对自由概念的区分与归类的片面性和“褊狭性”。他并不支持政治自由的一种定义式的观点，而是警告和反对当代围绕着这一种概念争论的非政治化倾向。

关注被丢失的历史也是斯金纳转向修辞的关键，这种修辞作为了一种多元主义的政治文化，而这以在对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utramque partem*）的论辩为基础的。在第六章中，我对这些内容做了分析。对在文艺复兴和近代早期作家中存在的修辞问题的洞见，使得斯金纳能够修正思想史和那个时期政治争论的特征。通过将罗马修辞中随意的褒贬法（*paradiastole*）的观念概括为一种对概念修辞性的重新描述的解释，并通过修辞的变化，斯金纳来解释概念的变化。在这里，斯金纳给大陆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富有价值的补充。同时，与科学和哲学的意识形态相比，他将修辞视为一种更多元、更有历史和政治性的思想类型。

昆廷·斯金纳是一个“创新的意识形态专家”(Skinner 1974b) 他对 20 世纪的政治和思想辩论作出了贡献。在最后一章里，我将把斯金纳对文艺复兴和近代早期政治思想的历史研究看作为政治理论化的间接模式，系统运用了一种布莱希特的“间

距效应(参见 Palonen 2002c)。这也使我得出如下结论,在任何意义上,斯金纳都是当代一位思想家,在他的世界观里,现在具有着对过去和未来的优先性。

这本书脱胎于一本篇幅更长的德文原稿《观念的祛魅》,这本著作将昆廷·斯金纳与莱因哈特·科泽勒克对概念变化的研究方法进行比较。在完成这本著作之后,我重读了我的德文原稿,发现我已经几乎在同一主题上写出了两本完全不同的著作。不仅两本书的语言和态度不同,而且方法和受众也不同,尽管我没有改变我的主题。此外,在本书中,也包括了考察斯金纳在《政治的视界》一书中对其文章所作的修改,以及他对自由概念所作出的贡献。与科泽勒克的比较以及对概念变化的关注导致了脱巫解魅式的概括,我希望这本著作可以改变德语世界很不情愿接受斯金纳的状况。

在本书中,我沿袭着我自己的一些实践,或者说惯例,正像斯金纳可能会这么说的,这些习惯也许并非不言自明,因而需要对此作些解释。

我优先引用斯金纳的论著的第一版本,采用那里面的表述。只有当斯金纳的表述改变或者补充了我的解释时,我才会参考后来的版本,当然,这种情况很少见。

关于引用,我使用的是带有两种改进的作者一时间系统。我在正文里提到著作的初版日期,在参考文献中注明了更容易得到的现代版本。例如,把韦伯的《经济与社会》作为“韦伯 1980”对我来说已是不合时宜了。第二点,对斯金纳已发表的著作,我修正了注释的字母表顺序,按照(a)专著(b)文章(c)评论、序言和(d)……其他次要著作之间的顺序进行安排。比如我把《理性与修辞》标注为 1996a 把《从休谟的意图到解构与回归》论文则标注为 1996b。此外,我选择不注明斯金纳所引的资料来源,比如霍布斯或马基雅维里,而仅仅采用他的引文。当然,对不同的作者我处理的方式也会不同,像伯林和佩蒂特,我把他们作为斯金纳的一种学术背景而分别加以讨论。

最后,为了强调我作为一个欧洲学者对斯金纳进行阐释,我参照了法文与德文的原版著作,并且引用了原文本的某些段落。如像韦伯和维特根斯坦的著作,我就是这么做的,而斯金纳在使用他们的著作时使用的是英译本。我这样做的原因之一,至少就韦伯或萨特的著作而言,我知道他们的著作常常被翻译得较为粗糙。另

一个原因也是为了抵制英语世界狭隘的自大。

就像我的注释所显示的那样，斯金纳本人给了我极大的帮助。他曾在多种场合乐意与我详细地讨论他的著作。通过这些讨论和对我的问题的回答，他特意提供了他的一些相对不怎么出名的著作，并澄清了他的不同著作所处的语境和观点。同时还提供了一些在他已发表的著作中并不清晰的表述。我从跟他的讨论中获益良多，这些讨论具有新的和不为大家所知的信息，同样，在不曲解他的思想的情况下，他鼓励我要阐述自己的理解，我也从他那种默示的鼓励中受益匪浅。最后，我也感谢他校对了我所引用他著作中的引文。

在最近几年，昆廷·斯金纳一直是我与同事讨论的核心话题。我与莱因哈特·科泽勒克、图恰·普尔克肯和梅尔文·理切特的辩论也特别值得一提。我还特别感谢朱斯·库鲁麦克、苏维·索尼内和塔帕内·特克卡，他们仔细阅读了原稿并提出了批评意见。最后，凯瑞思·克拉克对我的英文所做的修订对本书是至为重要的。

第二章

争议中的历史

1959年，斯金纳通过了牛津和剑桥的联合入学考试，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奖学金，进入了剑桥大学的康威尔和凯鲁斯学院(Skinner 2002d, 35)。此时，年轻的斯金纳已经是一个政治人('homo politicus)。他对艾登政府处理苏伊士运河危机的方式持强烈的反对态度，与父亲在英国殖民地政策上也有较大分歧(Skinner to KP, September 2001)。贝德福德学校的几年，他在拉丁语、历史和英语文学方面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斯金纳所进入的那个政治的与学术的世界是怎样的呢？那个时期的某些斗争与辩论值得作些概括。

此时，冷战仍然是世界主导性的分裂，但是前殖民地增长着的、正式的独立倾向在1960年明显加快了，并在不久产生了新的分裂。在学术界，对冷战思维的某种反感在50年代已然出现；在不列颠，我们首先能够在以罗素为主要代表人物的核裁军委员会中感受到这种反感。

冷战的二元思维正在失去力量的一个表现，可以在正在兴起的“意识形态的终结”的争论中看到。1955年在意大利米兰召开的文化自由会议使这个口号广为人知。许多著名的思想家，特别是美国的社会学家，如贝尔、利普塞特、西尔斯，以及欧陆的作者，如法国的阿隆和瑞典的汀斯特，都在大量的论著中重复“意识形态的终结”的口号，这一口号意味着旧的政治分歧已经开始弥合，也意味着对共识性、专家

治国型的政府政治学的向往。但专家治国的方式遭到诸如被誉为“福利社会主义者”的年轻斯金纳及其剑桥朋友的强烈反对，此时的英国从 1951 年起就开始了保守党的执政时期。（Skinner to KP, September 2001）

政治哲学终结了吗

斯金纳及其朋友倾向于把由皮特·拉斯莱特阐释的“政治哲学的终结”观点作为“意识形态的终结”命题的英国版本。1956 年，来自剑桥的历史学家拉斯莱特编辑了《哲学、政治和社会》系列丛书第一卷。在该书的《导言》部分，他写下了整卷书中被引用最多的一句话：“目前，不管怎么说，政治哲学已经终结。”（Laslett, 1956, vii）

在当时的语境中，拉斯莱特的主张具有特别的指称与靶子。在哲学领域，通过声称消解了经典问题，语言哲学的某些变种逐渐成为显学。“罗素、维特根斯坦、艾耶尔和莱尔使哲学家确信他们必须暂时从哲学中抽身，并重新审视他们的逻辑装置。”（ibid., ix）斯金纳明显不同意拉斯莱特对维特根斯坦的看法，他后来注意到，R·M·黑尔的《道德的语言》（1952）和 T·D·威尔登的《政治学的词汇》（1953）在 50 年代英国的辩论中非常突出（Skinner, 1999c, 61）。威尔登在书中宣称，通过对政治争论中词汇的“适当的使用”，便可以解决政治争端。

拉斯莱特的观点隐含着这样一个事实判断：那个时候风行的分析哲学，标志着为重大政治难题提供答案的那种经典的政治哲学“死亡了”。在该书《导言》的开始，拉斯莱特写道：

在我们国家的思想生活中有这样一个假定：在我们当中应该有我们称之为政治哲学家的人存在。哲学家本身是对哲学变化敏感的人，他们在尽可能宽阔的概括层次上来关注政治和社会的关系……在我们的三百多年的历史中，这样用英语写作的人物层出不穷，从 17 世纪初到 20 世纪从霍布斯到鲍桑葵。可今天，我们似乎不再拥有他们了。（Laslett, 1956, vii）

政治哲学消亡的原因之一是社会学方法的兴起，包括马克思主义和各种学院流

派。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拉斯莱特宣称，“他们的政治追随者在整个 20 世纪的巨大成功，似乎难以发现还有机会向他们提出政治方面的哲学问题”(ibid., viii)。社会学家虽然“接管”了社会及政治哲学家的领域，但他们“对这个领域却无所作为，或者至少说，没有表现出任何哲学兴趣”(ibid., viii—ix)。

对于拉斯莱特所说的那个语境，我们还可以加进政治科学离开哲学这样一种转向，在英国，这个转向的制度化阶段刚刚开始。“行为主义”或功能主义“经验理论”的纲领性宣言显示，作为哲学的替代物，一种科学主义的自我意识出现在这个学科的杰出代表中。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拉斯莱特的命题描述了一种广泛的、对政治哲学失去兴趣的状态，如果不是对其存在的合法性提出质疑的话。

在 50 年代，出现了对政治哲学研究模式的更进一步关注，尤其是在英语世界，虽然中间有德国流亡者的部分工作（例如，可以参见 Cunnell 1979）。诸如列奥·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和历史》(1952)、或艾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的《新政治科学》(1956)等著名著作，显示了政治哲学的一种复兴，这似乎是当时极不希望的。换言之，政治哲学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要么是极端的古典主义思考模式，要么是反民主思考模式 参见 Laslette, 1956, xiv)。

历史学家拉斯莱特有充分的理由来论证这一点：“实际情况可能仍然是，我们之所以没有政治哲学，是因为政治学变得太严肃，以致无法再留余地给哲学家”(ibid., vii)。不过他已经注意到在哲学家中已经出现愿意“对政治争论再一次承担他们的责任”的信号。“在这些微弱的信号中，有人可能希望建立一种盼望复兴传统的政治哲学的基础”(ibid., x)。这就使得人们思考这么一个问题：拉斯莱特是否愿意把这种“复兴”视为某种可欲的东西？

在 1962 年《哲学、政治和社会》丛书第二卷的《导言》中 拉斯莱特和 W·G·鲁西曼(W.G. Runciman)承认，1956 年挑衅性的《导言》写于“威尔登时代的全盛时期”。他们还不能完全宣布政治哲学已经复苏，“但语气已经完全不同”(Laslett & Runciman 1962, vii)，他们看到了“对政治理论……新兴趣的征兆”(ibid., viii)。在《哲学、政治和社会》第三卷中，编者提及政治哲学的复兴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Laslett & Runciman 1968,1)。

历史学家的辩护：拉斯莱特和波考克

拉斯莱特就这样打开了发明“政治哲学”而非现行哲学的空间。在他的著作中，拉斯莱特提出了把历史学研究方法作为研究政治思想的一种后哲学的选择。他通过编辑 1960 年版洛克《政府论》来促进这场讨论，对洛克研究来说，这个版本是革命性的。拉斯莱特的这个版本直接反对的是对洛克《政府论》作用和意义的陈旧解释：“在历史书籍和政治理论的著作中，洛克对英国革命的论述依然是显示政治事件与政治思想相互作用的最高典范。这个信念太根深蒂固，太有效，根本无法轻易放弃。但是事实的确不是那么回事。”(Laslett, 1960,46)

修正解释的办法很简单：把《政府论》主要部分的写作，定位于对菲尔默出版《父权论》以及对 1680—1683 年‘排斥法案’危机(exclusion crisis)的回应。“《政府论》实际上是一种对革命到来的呼吁，而不是对革命的合理性所作的辩护”(ibid., 47)。从这点出发，拉斯莱特得出结论说把这本著作视为政治哲学是错误的：“从我们讨论的角度来看，《政府论》作为对政治和文化氛围的一种回应，起源于 1679—1680 年的秋冬，整整比我们传统所认为的著书时间早了 10 年。它是一篇关于‘排斥法案’危机的檄文(exclusion tract)，而不是一本革命的手册(ibid., 61)。

拉斯莱特的《导言》包含着这样一个研究纲领，“历史”成了一种批判性的步骤，隐含着拉斯莱特对洛克文本的解读不同于哲学家们的解读。“我们的首要目标必须是一个谦逊的历史学家的工作，建立洛克自己想要它被读作的文本，把它置于历史的语境中——洛克自身的语境，然后去展示他自己的所想、所写和产生了历史影响的洛克之间的关联”(Laslett, 1960,4)。

这样一种把历史语境作为理解文本条件的观点并不新颖。柯林伍德在他的《自传》里就特别强调，在使用看起来是同一概念的时候，历史语境可以作为理解差异的条件。(Collingwood, 1939,113)拉斯莱特的独特观点是将语境和洛克的“影响”加以

对照 回到‘ 洛克自己想要被读作的文本 ’中。

这促使我们对意图进行讨论，而意图在战后的文学批评和哲学中，被认为是不相关的。对拉斯莱特来说，意图的作用在于理解洛克《政府论》的自我叙述，即它是介入当时争论的一部著作。通过运用洛克语境中的争论以及文本中的详细内容这两方面的知识来尝试复原这样一种自我理解，便提供了历史学家理解这部被视为政治行动的著作的方法。这种理解需要撇开这部著作的声誉和影响，而专注于那些对于洛克来说是现实可用的材料。

拉斯莱特捍卫历史学家的技巧，反对当代英国哲学家对“纯粹历史学家”的轻视。历史学家能够，至少有助于修正我们已经接受的观点，然而像威尔登那样的哲学家则只满足于重建我们已知的，正如我们已总结过其一般观点那样。

但是，这种观点并不是普遍适用的研究纲领。昆廷·斯金纳的老师约翰·巴洛(John Burrow)推荐他阅读拉斯莱特编辑的洛克《政府论》的版本，这对斯金纳日后的研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Skinner 2002d,41)。不过，在斯金纳看来，拉斯莱特声称他为洛克所做的工作，还没有人为霍布斯做过，因为后者的哲学比洛克的更加具有系统性。斯金纳认为这是一个挑战：“我已经深受其著作的基础性研究方法的影响，认为它是先验决定的，能够同样运用于霍布斯研究，并着手尝试这种研究。”(Skinner, 1997c,70)

斯金纳在大学课程中最喜欢的著作之一，就是波考克在剑桥的博士论文——《古代宪法和封建法》该书于1957年第一次出版(Skinner 2002d,42)。时任新西兰政治学教授的波考克(他出生于新西兰)在《哲学、政治和社会》丛书的第二卷里发表了关于政治思想史方法论的文章。拉斯莱特对波考克关于“不同政治思想家是在不同抽象思维水平中进行思考的”论点印象颇深(Skinner 2002d,48)。

波考克把历史作为一种论辩，这种观点不同于拉斯莱特。波考克提出，政治思想史属于一个特殊门类的传统，即“智识化的传统”。从这个视角出发，波考克强调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固有的二元主义：“政治思想可以被认为是社会行为的一个方面，是人们对彼此以及对他们社会制度的行为方式；或者，它可被认为是智识

(intellectuality) 的一个方面，人们试图获得对自己的经验和环境的理解。”(Pocock 1962, 185)

这个说法很好地表达了理解和研究“政治思想”的两个方面。波考克认为，政治思想史研究二元性中的两个方面都是合理的，思想史研究的抽象水平取决于该学科的性质。哲学的历史必须“追问它的理论抽象是否与实际经验到的实在相吻合”(ibid., 186)。与哲学家的“理性的重构物”不同，历史学家感兴趣的是当人们在有兴趣战斗、耕作或做其他任何事情时对政治的理解，也就是说，感兴趣的是他们作为个体在社会中的所作所为，他们的行为可以通过历史重建的方式进行研究，以显示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在这个世界中他们又为什么如此行事(ibid., 190)。

除了哲学家以外，历史学家中也有一些人是波考克批评的靶子：“这些人否认政治活动与政治理论之间有任何意义重大的关联。”(ibid., 191)他指的是围绕在历史学家路易斯·纳米尔(Namier)周围的历史学派，该学派很好地认识到政治原则可以被用作“宣传”，但是他们夸大了这种看法。援引波考克的话来说，“否认在政治中概念能够被孤立地使用，并显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并不等于否认它们不能起着任何一种作用”(ibid., 193)。

拉斯莱特对洛克的诠释导致他几乎把政治事件与实践的历史与政治思想史等同起来。波考克在“探索观念、信念和辩论如何帮助我们理解特殊情境下人的行动的历史学家的活动”，与“从他们特殊的情境与传统中研究思想活动、概念化活动以及抽象观念形成的思想史家”的活动之间，保持了“一种粗略的劳动分工”(ibid., 194—195)。他建议“把政治思想定义为政治讨论的语言”(ibid., 197)，允许向两个方向发展，特别是“通过相对稳定的概念的合规则的运用来研究政治思想史”(ibid., 195)。

较为准确的说法是，斯金纳所尝试的立场，是处于拉斯莱特和波考克的观点之间，同时又超越他们。在某个方面，他扩展了包含“思想活动”的政治事件概念，而没有把自己局限于波考克的“语言”和“稳定的概念”上。

对斯金纳而言，联结历史和哲学洞察力的模范人物是柯林伍德，在准备剑桥大学入学考试时，他曾经拜读过柯林伍德的著作 (Skinner 2002d, 35)。柯林伍德体现了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统一(实际上他是考古学家)他在《自传》里宣称：“在 20 世纪，哲学的主要工作就是认真对待 20 世纪的历史。”(Collingwood 1939, 79)他所认为的“历史”就是修正问题的历史 对立于是他称之为“剪刀”加“糢糊”的历史写作 这种历史在他的考古学实践中已经熟悉 (ibid.)。

柯林伍德将历史和哲学相统一的范式在于他的“问答逻辑”，这种逻辑把历史问题作为其出发点：“某某人想要把这个命题作为什么问题的答案？”(ibid., 39)对于柯林伍德来说，“政治理论的历史并不是将不同的答案给予同一个问题的历史，而是一个问题本身变动不居、答案随问题一同变化的历史”(ibid., 62)。

把‘历史的’作为标准

我想通过对斯金纳不为人知的大学时代作品的解读来评估他作为历史学家的素养，这些作品主要涉及戏剧史。在贝德福德读书时，他利用假期就写了分析辉格党政治家萨缪尔·怀特布雷德二世 (Samul Whitbread II) 生平的系列文章。像历史专业的其他学生一样，斯金纳从自己以前接触到的史料开始其研究，就这项研究而言，文献选集只是到最近才为公众所利用。

1961 年，斯金纳发表第一篇论文，该文描绘了一位曾经著名的政治家形象，此人从 1790 年参政到 1815 年自杀，一直是来自贝德福德的下院议员。这篇论文完全掌握了那个时代的人物和事件，引起了学界轰动，人们难以置信它出自一名大学生之手。正如后来斯金纳提到的（例如，Skinner, 1998, 12）当时明显的兴趣在于“把已经尘封的知识瑰宝重新显现”在于探求过去世界的陌生性。《怀特布雷德文集》“向我们展示了作者对简·奥斯汀时代英格兰生活既难以琢磨又令人着迷的研究” (Skinner 1961, 21)，而这一时期是斯金纳先前从未仔细涉及的。

利用怀特布雷德的家族档案以及当地历史学家的叙述风格，斯金纳另写了一篇